

德国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德国联邦财政部原部长奥斯卡·拉封丹
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如是说：

不要恐惧 经济全球化 人人富裕和就业

[德] 奥斯卡·拉封丹 克里斯塔·米勒 / 著
柴方国 / 译

Keine Angst vor
der Globalisierung

改革出版社



不要恐惧 经济全球化 人人富裕和就业

[德] 奥斯卡·拉封丹 克里斯塔·米勒 / 著
柴方国 / 译

**Keine Angst vor
der Globalisierung**

改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要恐惧经济全球化：人人富裕和就业 / (德) 拉封丹, (德) 米勒
著; 柴方国译.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9.12

ISBN 7-80143-359-9

I. 不… II. ①拉… ②米… ③柴… III. 国际经济关系—经济一体化—
研究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57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1999-2667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责任印制: 刘志豪

不要恐惧经济全球化——人人富裕和就业

[德] 奥斯卡·拉封丹 克里斯塔·米勒 著

柴方国 译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 10 千字 220

印数: 10000 册

ISBN 7-80143-359-9/F·186

定价: 20.00 元



施罗德夫妇、拉封丹夫妇
1997年8月初在萨尔州



拉封丹与儿子卡尔-莫里斯在一起

拉封丹一家与施罗德夫妇



不要恐惧



经济全球化

拉封丹与政治盟友菲舍尔在一起





拉封丹与施罗德、菲舍尔在一起



1998年，大选获胜后的拉封丹：“现在整个世界是个金融投机的赌场。”



辞职后的拉封丹：
“无力应付日常的计
谋。”



拉封丹与社会民主党前任主席沙尔本交谈



拉封丹与施罗德：“我们被拴在一起了。”

拉封丹与施罗德：“我们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我们相互依赖。”

前 言

近年来的经济政策试图给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找到一个答案。人们大谈所在地竞争,所在地政策已成为几十年来的流行语。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声称,“所在地德国”不再具有竞争力,我们错过了发展机遇,必须花大力气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听惯了经济界关于盈利太少的抱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年来决定关于所在地讨论的人已经使德国人相信,“所在地德国”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数字却表示了相反的事实: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德国按人均计算仍是世界上出口能力最强的国家。居高不下的、并且近来重新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让我们的伙伴陷入困境,尤其对我们的欧洲邻国来说,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人们对国际金融市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指责,然而无论如何,它不会让一个不良所在地的货币持续升值。

即使如此,多年来,在节庆场合合作经济政策报告的人无不大谈全球化的危险,抱怨所在地德国缺乏竞争力。科尔政府曾长期支持这种说法,近来却发现它成了一个乌龙球。例如,人们可以注意到,联邦教育与科技部部长吕特格斯于1998年1月得出结论说,德国是欧洲范围内最好的生物技术基地。连波恩联合政府在经济界的追随者也争取在1998年选举中换个说法。西门子公司总裁亨利希·冯·皮埃尔也于1998年1月指出:“我们借助于降低成本、创新和增长又重新具有竞争力了。”

只要留意一下德国和欧洲几十年来关于经济发展的时髦争论,就会发现有人早已提出警告。在60年代,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出版了一本很受德国人欢迎的书,书名叫做《美国的挑战》。

塞尔旺·施莱贝尔在书中提醒人们注意来自美国经济的危险,担心美国的康采恩会吞并欧洲的公司。而在今天,担心却成为时尚。人们现在担心的是美国的康采恩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对德国投资太少。目前的观念认为,众多的外国企业进驻哪些国家,便证明哪些国家的所在地质量高;相反,企业从哪些国家撤资,便说明那里的所在地质量低。

如果用该标准衡量日本,便会得出令日本经济界失望的结果。多年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明显多于外国对日本的投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从未把外资进入当作正面的所在地标准。日本与其说鼓励外资进入,还不如说抑制外资。

在80年代,人们则大谈来自日本的危险。法国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提醒人们警惕“黄色蚂蚁”。在德国,“日本股份公司”曾成为一个话题。各种联合会的领导人物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日本国民经济的飞跃。目前,这类讨论也已销声匿迹。日本之所以出现经济问题,原因也同德国一样,即在80年代过于倚重出口。自从转向所在地政策以来,日本和德国都忘记了在经济政策上除了追求增长、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以外,还应当追求对外经济平衡的目标。

关于“黄色蚂蚁”的讨论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那些受利益驱动的所在地专家又发现了新的危险。他们转而认为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是“亚洲四小虎”。大量的报告和评论都在展示“亚洲四小虎”的国民经济发展得如何如何好。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这类讨论也休止了。“亚洲四小虎”遇到重大的竞争问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帮助才能抑制货币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由投机性的金融交易、不动产交易和不正当的信贷交易所引发的危机局面会使何人受害。可以肯定,受害者不是那些作出错误决策并

应当承担责任的人,错误决策的直接受害人必然是纳税人、银行储户和股民。波恩政府为德国公司在危机国家的生意提供了 250 亿马克的担保。一旦担保到期,各公司就会向联邦提出要求,而付钱的必然是德国的纳税人。

为防止危机蔓延,截至 1998 年 1 月中旬,世界各国已投入 1000 多亿美元。然而,早在 1994 年,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克服墨西哥危机投入 500 多亿美元时,就有人质问用税款缓解投资风险的做法是否正当。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梯特迈耶尔说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不能让人觉得它虽然能够获取高利,但后来肯定又会被国际社会捞回去。”

“亚洲四小虎”的发展状况所提供的教训在于:德国的经济政策不能追随那些时髦的空话,而要把谨慎的分析和事实作为决策的基础。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在书中我们必须使用一些图表和数字,这一点希望得到读者谅解。原因在于,如果不谈事实,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表述极易被滥用于意识形态目的。

亚洲国家的金融问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关于放松调控的信条并非万应灵药。金融市场无疑已实现了全球化,但是,众多专家对完全自由的资本流通和弹性汇率所抱的期望没有得到实现。国际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不是放松调控,而是重新加强调控。美联储前主席保罗·福尔克尔所领导的布雷顿森林委员会提出此类建议;国际著名的外汇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也不遗余力地要求对金融市场实行国际调控,以便遏制投机。

关于全球化和所在地德国的讨论已堕落为毫无内容的流行话争论。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大谈放松调控,而且尤其要求降低成本。他们直截了当地把国民经济混同为企业管理经济,忘记了在国民经济学中一方支出相当于另一方收益这一无可争辩的定理。因此,他们认为,面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各国国民经济只能在

尽量降低企业税和协议工资,削减社会福利以及限制雇员权利方面进行竞争。在德国,这类错误预言家的首要人物是德国工业界联合会主席汉斯·奥拉夫·亨克尔。此人如此相信“缩减”(downsizing)学说,以致于实实在在地为东德许多企业可以不遵守劳资合同而感到陶醉。他要求以此作为榜样,并建议西德也实行这种做法。然而,至少在这一点上,即使笃信曲解了所在地竞争的错误学说的人也会产生怀疑。信守已达成的合同对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至关重要,号召人们毁约的经济哲学是自相矛盾的。

长期以来,德国信奉降低成本竞争的人以“改革者和倡导现代化者”自居。以前,德国人所理解的改革,是指立法者作出有益于多数国民的决定,改革使许多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现在,德国人一听到改革这个词,就会吃惊地捂住钱包。而科尔政府则乐此不疲地把一系列削减社会福利和限制雇员权利的措施称为“改革”。

当德国经济界的代表人物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时,“改革家”诺伯特·布吕姆十分诧异地质问他们:“资产税取消了,工商业资本税取消了,对铁路、邮电实行了私有化,改革了工资继续支付的办法,改革了商店关门的时间规定。改革了解雇保护法,改革了限期劳动合同规定,改革了恶劣天气补贴办法,改革了青少年劳动保护规定,改革了失业救济,改革了劳动促进法,改革了养老保险。难道这一切毫无意义吗?”他在写给各议会党团的一封信中自豪地指出,通过改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每年节省约980亿马克。为“答谢”他的这种“改革努力”,工业界联合会主席骂他为“宫廷小丑”。以怨报德真乃世间常事!人们把减少养老金说成养老金改革,把取消解雇保护法说成改革解雇保护法,把减少对生病雇员继续支付的工资说成改革工资继续支付办法,把减少失业金和失业救济金说成改革失业金和失业救济金。假如这一切有益于减少失业,人们尽管去说好了。然而,如果没有产生减少失业的结果,改革概

念就会走向其对立面,改革就会变成复辟。经合组织在其正式文件《新的全球时代》中称颂 19 世纪“市场导向的经济制度创造财富的能量”,这是由社会市场经济向德国经济繁荣年代^①那种大众贫困局面的倒退,而这种倒退或许是不知财富和自由为何物、把失业归咎于自身命运的社会的梦想。没有哪个雇主联合会像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那样赤裸裸地把欧洲的失业归咎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劳动保护规定,这并不奇怪,因为经合组织的经济学家本人在优越的巴黎第十六区拥有报酬优厚的、并享有税收优惠的长期劳动岗位。现在已到了恢复改革概念本意的时候,应当重新把改革概念同提供更多机会、改善生活条件的政治和社会转变联系起来。

譬如,让雇员分享生产资料便是一项多年来没有实现的改革;对税收和收费制度进行生态性的改造也是一项改革,它有益于我们为后代人改善生活条件;降低社会公共福利费、减轻劳动要素的负担也是一项必要的改革,它有利于重新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此外,提高子女补贴费同样是一项为德国众多家庭所期待的改革。

奉行国民经济的降低成本竞争,这种错误学说的人不满足于改革者的称号,他们还自称是倡导现代化者。

在这里,“现代”的概念也被颠倒了。欧洲的“现代”观念与启蒙哲学密切相关,而启蒙哲学的实质在于个人的自由。启蒙哲学曾是法国革命的基础,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启蒙哲学认为,自由、机会平等和互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现代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机会平等和社会互助。

限制雇员权利、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学徒岗位的做法同现代概念相互矛盾。同样,大量解雇的消息使交易所兴奋不已的现象也与现代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现代概念同新自由主义的学说恰好相

① 指德国 1871 年至 1873 年期间的经济繁荣时期。——译者注

反。即使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信徒自称是改革者和倡导现代化者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许多保守党的“改革者”和“倡导现代化者”在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错误地贴上“改革”和“现代”标签的极端市场主义导致对传统价值和结构的破坏,而这些传统价值和结构却是全世界保守党人的行动基础。对毫无限制的雇员流动性和轮班工作或周末班工作的要求损害了家庭;对电视全面商业化的要求改变了人们及其家庭的生活,引诱青少年的模仿本能,导致暴力和犯罪;社会福利的极度削减和劳动岗位的丧失则导致绝望、毒瘾和酗酒。执政党联盟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洋洋自得地称自己是真正的改革者,是因为他们对改革概念的理解有误。

全世界都已围绕新自由主义方案是否对全球化的正确回答展开争论。在欧洲,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政府更替即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决。

全球化争论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正如本书的图表所示,彻底全球化了的经济并不存在。我们拥有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但商品市场主要是地区化的市场,如处于依然封闭的国民经济条件下的欧洲商品市场或美洲商品市场。虽然我们遇到移民问题,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性亦越来越强,但是,劳动市场依然主要局限于国内。虽然有些无视现实的人声称,十几亿中国人有朝一日会排挤德国雇员,然而,这种说法同人们几十年来所违心传扬的口号“俄国人来了”一样,是经不住推敲的。

世界各国的大多数雇员希望本国具备良好的劳动条件。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一种能够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政策来帮助其他国家,最终使这些国家实现自助。在这方面,强行降低成本的政策也会造成重大的损害。如果一味地追求把外国企业、甚至整个国家排挤出市场,就会迫使人们逃离本土,到国外寻找自己的幸福。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欧洲。不必奇怪,如果我们通过工资倾销占领外国市场,那么,外国雇员很快就会涌进我们的国门。因此,尤其在货币联盟中,各国必须量入为出。任何人不得要求高于本国水平的工资,但工资也不能长期偏低。强行降低成本的政策势必破坏货币联盟,因为它迫使其他国家走进通货紧缩的旋涡。

全球化是用得最多的、为德国经济政策失灵辩解的托词。在这方面,数字也能够充分说明问题。我们的失业率、国家债务和雇员的税费负担均创下纪录。科尔政府成功地让部分公众相信,以上问题都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结果。本书将证实,德国的问题主要是自己酿成的,是科尔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而错误的政策所依据的错误观念即是国民经济必须通过降低成本竞争来对付全球化。然而,这正是全部争论的症结所在:我们不能通过追逐尽量低的工资、尽量少的社会福利、尽量低的企业税和环境标准,来回应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日益交融。国民经济的“缩减”政策恰好不是一个国家对付全球化的办法。

欧洲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降低成本竞争是条歧路。税收收入不断减少,将使欧洲所有国家无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即便是德国负责鉴定整个经济发展的专家委员会也改变了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专家委员会认为,值得评判的不是争取实物投资的所在地竞争,而是税收竞争,因为后者只会造成税额估算基础的转移,尤其是金融资本及其收益的转移。转移税收基础可以获得其他国家税收优惠的好处,同时却又享受本国基础设施的种种便利。专家委员会主张借助国际协议约束此类税收竞争,即要避免此类竞争。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保罗·基希霍夫持同样的看法。他在不久前谈到:世界各国需要一项国际法协定,用它来约束所有工业国家对资本收益实行大致相等的征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国家就谈不上税收公正。

极端市场主义诱使一些人把塑造世界共同体的惟一的制度功能寄托于市场。如此一来,我们希望怎样生活的问题只能靠市场来回答。然而,弗莱堡学派早就清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能够为自由竞争制定制度框架,同时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维护竞争的制度政策。该学派的创始人是瓦尔特·欧根。路德维希·艾哈德执政时期,科隆的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促使该学派的经济学说大行其道。奇怪的是,弗莱堡学派的思想财富被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完全抛弃,否则,人们难以解释这些政党为何如此不理解、乃至拒绝为自由竞争制定国际制度框架的要求。弗莱堡学派经济学家在战后年代曾认为对市场经济无疑要辅之以国家的制度框架,因此,可以设想,在经济日益欧洲化的时代,他们会要求建立欧洲的制度框架;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们会要求建立促进企业自由竞争的发展的全球性制度框架。

全球性的极端市场主义对政治提出宣战。因此,建立国际制度框架的要求,首先意味着要求重新恢复政治的权利。

在如下领域,我们需要国际合作:

- 稳定汇率;
- 面向稳定、同时面向增长的利率政策;
- 适合于经济形势、面向就业的预算政策;
- 公平的税收政策;
- 共同的技术政策;
- 国际社会宪章;
- 制止全球环境恶化的计划;
- 持续加强国内需求。

与保守党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反驳我们时所表达的观点不同,

上述对国际合作的要求并非要否定竞争,相反,它们是企业自由竞争的前提。我们的主张并不反对通过加强创新和改善产品来提高生产率的竞争,而是反对经济上荒谬的、追逐最低的工资、社会福利、环境标准和资本收益税的竞赛。只要回顾一下20年代的贬值竞赛及其可怕的结局,就会发现这类竞赛实质上并无新意。贬值竞赛是1929年大萧条的根源,并导致凯恩斯经济学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生。

对全球化的正确回答是,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生产率竞争。我们需要良好的培训制度、学校和大学,需要良好的研究机构,在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方面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最高的能源生产率,只有拥有优良的环境技术的国家,才能获得供应未来市场的重大机会;我们必须在发展节能技术和开发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前面,因为矿物燃料是有限的,后代人需要依赖再生能源。我们应当为走向太阳能时代搭桥铺路。

即使有全球性的话题,它首先也不是被曲解了的所在地竞争,而是世界各国为后代人留下一个宜于生活的环境的职责。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在这方面也有害无益。放松对环境标准的调控或许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差方案。我们需要欧洲层面上的环境标准——如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所证实的那样——也需要在环境目标上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并要求世界各国确实遵守它们。即使具有保守倾向的德国专家委员会也在其最近的年度鉴定报告中指出:“凡涉及保护和有效地利用全球环境财富的地方,都应当借助国际协作取得广泛的成就。这种做法并不排除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根据自身情况先行一步的可能性。”发达工业国家不能为南方国家规定人均能源消耗量,然而,只有当工业国家发展环境技术并达到能够为全世界接受的环境标准时,全球生态恶化的过程才能得到遏止。实现上述目标的市场经济手段是实行生态税、费改革。生态税、费

改革将体现真实的价格,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并转变那种导致大量失业的社会发展趋势。直到今天,经济界仍把诸多努力的重心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然而,由于大量失业现象的存在,今天的当务之急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反,我们必须把以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那种干劲转而用于提高能源生产率,以便为后代人留下一个宜于生活的环境。提高能源生产率是借新技术、新生产工艺增设劳动岗位的机会。

目前,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拥有改善环境所必需的技术知识和财力,它们应负首要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没有履行这种职责,它在东京气候问题首脑会议上阻挠作出任何必要的决定。只有当人们节省资源时,环境才能得到拯救。在我们的议程中,必须把经济的可持续性放在最前面。因此,本书对耐用和耐久的产品作了全面辩护。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快餐社会”,提倡延长产品寿命会遭到明显的、经济学上的异议。然而,即使在今天也能看到,总计起来,维修和服务往往比快速销售一次性产品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

由于在世界经济迅猛增长过程中缺乏预防措施,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其最近出版的关于地球状况的年度报告中对此再次提出警告。该所的研究者要求彻底改造世界经济体系,以便制止对环境的破坏。研究所主任莱斯特·布朗解释道,这种改造决不意味着放弃增长,而是要改变增长的方式;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前提已经具备,而政治迄今却迟迟没有通过相应激励机制促进必要的转变。

通过教育和培训使人们具备应付重大挑战的能力,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无论比尔·克林顿还是托尼·布莱尔都在最近的竞选提出“教育、教育、教育”的口号。英语中的“教育”概念比德语中的培训概念寓意宽泛。“教育”不仅意味着传授知识和能力,而且